

崇义弘儒道 融脉润黄河

——鄆城元代崇义书院的薪火新生

书院小档案

名称:崇义书院;曾用名:早期为唐氏家族义塾、家塾、庙学,无正式定名

兴建时间:始建于元至治三年(1323年),元至正十三年(1353年)建成完整规制书院,元至正十八年(1358年)获朝廷御赐定名

原址位置:古鄆城(今鄆城县旧城镇一带)

现存状况:原始古建筑遗迹已湮灭,书院文脉、育人理念、家风典籍完整留存,当代活化传承,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

代表人物或轶事:元代唐兀崇喜,乱世义塾遭焚仍坚守兴学,捐私田办学,汇编《述善集》,惠及乡里寒门子弟

鄆城县地处鲁西南平原、黄河之滨,是上古舜帝躬耕之地、千年古邑,历史文脉绵长,文教底蕴深厚。坐落于此的元代崇义书院,是鲁西南极具代表性的古老书院,由西夏遗民唐兀氏家族创办,既是黄河沿岸文教兴盛的生动见证,更是中原大地民族融合、文化共生的精神坐标,在中华古代书院发展史、民族文化交融史上占据独特地位,兼具深厚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。

崇义书院肇始于元代,迁居鄆城的唐兀氏家

族倾心仰慕中原圣贤文化,坚守崇文重教、崇德尚义家风,主动研习儒学经典,推动民族文化深度交融。元至治三年(1323年),唐兀马哈建议塾;泰定年间(1324—1328年),其子唐兀达海予以扩建,彼时仅为简易家塾,尚未形成书院规制。元至正十三年(1353年),唐兀达海之子唐兀崇喜在鄆城新建完整庙学,具备完备的书院办学规制。崇义书院以家族捐资为主、官府督导为辅兴办义学,是元代为数不多由少数民族先贤创办、朝廷正式敕赐定名的正统书院,在古代教育发展史上独树一帜。

崇学弘道 立德树人润泽乡土

书院立学之初,便以传承儒家文脉、涵养道德品行、教化乡里百姓、培育栋梁之才为根本宗旨,打破族群界限,广纳四方学子求学问道。治学过程坚持知行合一、德才并重,既传圣贤诗书文脉,又树忠孝礼义品格,以文化教化凝聚人心,以道义精神润泽乡土。

唐兀崇喜兴办书院的赤诚初心,在《述善集》中留有一段动人记载。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,战火席卷中原,生灵涂炭。唐兀崇喜早年创办的义塾惨遭焚毁,房舍坍塌,礼器散失,学子离散。乱世之中,乡人纷纷劝其弃学避祸、保全身家,他却慨然言道:“书院可毁,儒道不可断;身可避,善不可退。”即便暂避他乡,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乡里子弟的求学之路与文脉存续之事。

待局势稍定,唐兀崇喜即刻返乡,秉持“宁得子孙贤,莫求家道富”的家训,倾尽家族之力重建学堂。为保障书院长效运转,唐兀崇喜拿出个人积蓄投入办学,缩减家族日常开支,划拨农田5

余亩作为固定学田,明确田租专项用于延聘师资、接济学子、修缮建筑、开展祭祀,并立下规约,学田严禁私人赎回、典售挪移。在其坚守之下,四方贫苦子弟均可免费入学,无分族群,不计贫富,琅琅书声再度响彻黄河之畔。

元至正十八年(1358年),朝廷嘉许唐兀崇喜崇礼兴义、化俗育材的义举,御赐匾额“崇义书院”。同年,他将建塾兴学、捐田助学、乡规民约、家族德行等内容汇编为《述善集》三卷,完整记载书院治学思想、育人理念与家风道义。该书既是传承古鄆文脉的珍贵典籍,也是研究民族文化融合、挖掘传统教化思想的文化瑰宝,为后世文脉传承留存了翔实史料。

文脉共生 镌刻民族同心印记

悠悠古书院,浓浓民族情。崇义书院扎根黄河之畔、古鄆沃土,历经岁月沧桑,铸就了民族交融共生、文化同源同心的精神典范,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历史底蕴,彰显出各民族同心向善、崇文向学、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。其官民协力、兴学育人的办学模式,凝聚起全社会尊师重教、兴学助教的强大合力,传承了崇文尚学、明礼崇德、包容友善、实干向善的优良乡土

民风,为鲁西南地域积淀了厚重的精神文明底蕴。

世事浮沉更迭,文脉生生不息。历经水患困扰、岁月变迁、时代流转,崇义书院原有建筑遗迹虽已消逝,但千年传承的育人思想、道义精神、崇文风尚始终根植古鄆大地。自明代纳入地方教化体系以来,书院倡导的修身立德、敦亲睦邻、重教兴学、团结和睦等传统理念,代代浸润乡土民风,持续滋养群众精神世界,成为涵养淳朴乡风、培育文明家风的重要源泉。

薪火赓续 古韵新声赋能今朝

文脉兴则地域兴,文化盛则风气正。新时代背景下,深挖崇义书院历史内涵与精神内核,是延续古邑文脉、活化黄河文化的重要举措。

当地立足书院独特文化资源,传承崇文重教、交融共生的优良传统,推动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融互通,大力弘扬崇德向善、尊师重教、团结包容的文明新风。以古贤文脉浸润乡土、凝聚民心,持续厚植地域文化自信,让千年书院古韵焕发时代新生,为鄆城精神文明建设、乡村振兴及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力量。

刘永霞 孔祥娟

八里河

八里河村位于鄆城县城正南方,北靠宋金河(古称五大河),西临鄆巨公路,交通四通八达。北宋建隆二年(公元961年),宋金河疏浚通航,自此舟船穿梭,水运发达。据村内古庙碑文记载,古村名为顺河集;明朝万历年间更名为八东村,后因地处宋金河南岸,距老县城约4公里,定名八里河村。

清末,该村隶属鄆城县八东里;1928年隶属鄆城县一区鄆林乡;1940年至1952年隶属鄆城一区,1952年划归四区;1956年隶属丁里乡;1958年设立八里河大队,隶属丁里公社;1984年设立八里河村民委员会,隶属蒋庙乡;2001年乡镇合并后隶属鄆城辖;2015年5月划归鄆州街道办事处管辖。

全村现有1086户、3276人,聚居樊、徐、赵、刘、魏等18个姓氏。明朝正德年间,樊氏先祖樊继贤自鄆城南关迁至此定居;明朝洪武年间,徐氏、赵氏先祖先后从山西洪洞县迁居于此;清朝康熙年间,刘氏先祖自本地柳条圈迁来。其余姓氏自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陆续落户本村,各姓氏和睦共处、团结互助,乡风淳朴。

88年前,惨烈的八里河阻击战在此打响。1937年,日军为打通济宁至开封交通线,图谋进犯鄆城,频繁出动飞机轰炸县城。1938年3月,国民党第二十三师李彦吾率六十九旅驻防鄆城。鄆城中心县委积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,选派干部进驻鄆部开展抗日宣传,极大提振了官兵的报国斗志。

1938年5月13日,日军土肥原兵团集结万余兵力,在飞机、坦克掩护下进犯鄆城,先头部队抵达八里河村。守军奉命就地阻击,在村南鄆济公路两侧迎击来敌。面对日军疯狂冲锋,官兵依托壕沟、坟头等简易掩体顽强死守,击退多次进攻,歼敌甚众。激战至傍晚,阵地遭炮火摧毁,部队被迫退守村内。

日军全力猛攻村落,炸毁寨墙,寨门后涌入村内,双方展开激烈巷战,鏖战至午夜。我方杀敌无数,部队伤亡同样惨重。为掩护村民安全转移,守军组建敢死队,在村南门与日军展开白刃血战,拼死阻敌,成功掩护群众和幸存官兵突围,多数敢死队队员壮烈牺牲。

此战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、击毁坦克2辆。日军随后对八里河村展开血腥报复,大肆烧杀抢掠,百余名未撤离村民遇害,多名村民惨遭酷刑致死,七户人家惨遭灭门,村内血流成河,惨不忍睹,日军暴行罄竹难书。

八里河阻击战守军虽因兵力悬殊最终撤退,却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,极大振奋了鄆城人民的抗战信心。

岁月流转,硝烟散尽,悲壮的历史被八里河村民世代铭记。如今的八里河村依河而居,风光秀美,河水荡漾,四季景色如画。村民全部入住新式楼房,生活设施齐全,村庄深度融入城区发展,群众安居乐业,过上了安定富足的幸福生活。

魏建国



护守生产堤

儿歌曰:生产堤,弯又长,守住良田守家乡。扛草捆,运土筐,大家齐心护堤墙。风雨来,浪打忙,一锹一土筑坚强。堤稳固,庄稼香,岁岁平安粮满仓!

在鲁西南黄河沿岸,除了巍峨的主大堤,还有一道贴河护田的堤堰——生产堤。它虽不如主堤宏伟,却守护着滩区的田地收成与百姓生计。千百年来,修堤、护堤、守堤,早已从农事水利,沉淀为代代传承的滩乡民俗。

黄河滩区地势低洼,汛期河水上涨,生产堤是守护良田的第一道屏障。护守生产堤是沿河村落传承已久的乡规。旧时修堤无机械,全靠人力劳作,各村按地亩、人口出工,户户出力,不分贫富,是滩区不变的老规矩。

每至汛期时节,村民们自发集中培堤护堤,众人挖土垫土,层层夯实,恪守代代流传的护堤老礼:不挖堤脚土方,夯实每一寸堤土,爱惜堤上草木。民间素有“堤上有草木,河水不欺人”的说法。

打夯之时,浑厚苍凉的黄河号子一呼一应,既是劳作鼓劲,也是百姓祈愿安澜、抵御水患的质朴期许。

长久以来,滩区人恪守敬畏大河的守堤习俗。生产堤低矮薄弱,易被河水冲刷漫溢。每逢汛期,村民自发轮班值守,白日排查堤身隐患,夜里提灯巡堤,风雨不歇。祖辈传下严明规矩:严禁堤上嬉戏、乱挖破土,戒绝言行失礼,全力守护堤体稳固。

汛期守堤之时,村民自带粗茶淡饭值守堤畔,不分远近亲疏,守望相助,共护家园,勾勒出淳朴动人的乡俗底色。

如今滩区迁建,村落面貌焕然一新,生产堤褪去往日繁忙,但根植于乡土的护堤记忆从未消散。夯实的堤土、悠远的号子、恪守的乡规,早已融入乡土血脉。护守生产堤,护的是一方水土,守的是滩区民俗,承载着沿河百姓对土地的眷恋、对大河的敬畏、对家园的深情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文庙沉碑处 千年儒风长

——单县湮没的儒学圣地

一城文脉,起于圣贤,盛于教化。曾经的文庙,是古代单县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,也是当地崇文尚学、尊儒重教千年风尚的鲜活见证。

单县古邑的记忆里,文庙街便是因这座千年学府应运而生,街巷肌理间仍留存着代代相传的儒雅古风。

单县毗邻儒家文化发源地曲阜,深受孔孟思想浸润,重教兴学历史悠久。

文庙古时为郡学所在,既是祭祀至圣孔子的礼制庙宇,也是一方传道授业的最高学府,承载着教化百姓、涵养文风、培育人才的重要使命。

元代,单县儒学蓬勃兴盛,文庙历经扩建修缮,规制恢弘,气势庄严,成为鲁西南地区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阵地,深刻影响着一方民风教化。

岁月流转,石碑留史。

2009年,单县老城区改造施工中,一块巨型元代文庙碑重见天日,为文庙悠久历史提供了坚实物证。

该石碑通高4.1米、宽1.1米、厚0.3米,连带底座重达20吨,工艺精湛、保存完好。碑文由谢伯僚、谢逊撰文书丹,清晰记载元至正十七年(1357年)单州文庙重建始末与弘儒兴教的时代意义,碑背镌刻着捐资修缮的各界乡贤、官吏姓名。碑首双龙戏珠、凤凰展翅的精美浮雕,尽显元代石刻艺术的高超水准。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证

认定,单县文庙文脉可追溯至五代时期,是北方罕见的古老文庙遗存,文化价值弥足珍贵。

史料与传说勾勒出文庙昔日盛景。旧时文庙占地宏阔,格局规整,以大成殿为核心,殿内供奉孔子圣像,配祀颜回、仲由等孔门贤哲。整座建筑群布局严谨,错落有致,棂星门、泮池、照壁、东西庑、尊经阁及各类祠宇依次排布,构成完整的儒学礼制建筑群,彰显着古单州敬圣贤、重诗书、崇德行的淳朴民风。

在古城布局中,文庙坐落於老城核心、衙署之前,足见古时崇文先于理政的城市规划理念与价值取向。相较于屡遭战乱损毁的官署衙门,文庙作为文化圣地,历经多代修缮扩建,保存更为完整,底蕴更为绵长。可惜这座千年文脉地标,于民国年间渐趋湮没,尘封于岁月记忆,昔日文脉盛景只留史载与传说。

时代变迁,街巷更迭,老城改造让古文书逐渐淡出视野,但千年儒风从未消散。从古文庙的兴衰更迭,到如今单县大地崇文重教的蔚然新风,圣贤文脉跨越千年生生不息。

这片古老土地沉淀的儒学底蕴与书香气韵,始终滋养着单县的城市气质,成为古城最温润厚重的文化底色。

文/图 刘波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黄黄」

鲁西南一带的民间方言土语,保留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市井口语,不少方言土语历经几百年岁月洗礼,依旧鲜活地回荡在乡野街巷、日常闲谈之中。例如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等名著中,就记载着不少与鲁西南方言相契合的词语。这其中,有一个费解的方言——“黄黄”。

“黄黄”,在鲁西南民间,有的也叫作“黄子”“熊黄子”。它并不是指代颜色泛黄,而是当地人日常使用的口语,可溯源至明清白话小说,是留存至今的方言活化石。这个词的来源很复杂,但使用场景十分常见。笔者曾听闻这样一个方言故事。一位外地青年男同事某日因事前往鲁西南乡村,拜访一位未婚男同事,恰巧该同事不在家。外地青年随即询问其去向,其母回答:“谁知这小黄黄去哪儿啦!”外地青年不明所以,带着疑问的语气问道:“小黄黄是他的乳名吗?”其母只得尴尬答道:“不是。”在鲁西南本地人看来,这便是不懂方言闹出的笑话。

其实在这位母亲的口语中,“小黄黄”是对儿子的一种昵称,特指未婚的年轻人。这类昵称暗含孩子年少调皮、不够省心、略显顽劣的意味,带有轻微贬义,却毫无憎恶、厌弃之意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中,刘姥姥训斥板儿道:“下作黄子,没干没净的乱闹。倒叫你进来瞧瞧,就上脸了。”此处的“黄子”,同样指代顽劣淘气的孩童,亦有研究者据此词语考证,推断刘姥姥为山东人。对于大龄青年,父母一般不会使用这一称谓。

若众人私下评价他人,众口一词说道:“这黄子,忒不咋样!”此处的“黄子”,则为纯粹贬义,指代为人处世不端正、品行不佳、不被旁人认可的人。同时,“黄子”也可形容办事拖沓敷衍、杂乱无序。例如:“你看你把报表弄得啥黄子?乱七八糟!”

而“熊黄子”,则在此基础上加重贬义色彩。为何冠以“熊”字?可溯源至上古有熊氏文化,笔者在《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“熊孩的”》一文中已有阐释,此处不再赘述。

《红楼梦》中曾多次提及“黄子”。第六十三回中,佩凤、偕鸾二人前去打秋千,宝玉便道:“你两个上去,让我送。”佩凤连忙说道:“罢了,别替我们闹乱子,倒是叫‘野驴子’来送送使得。”宝玉笑着连忙回应:“好姐姐们别烦了,没的叫人跟着你们学着骂他。”偕鸾又道:“笑软了,怎么打呢?掉下来栽出你的黄子来。”佩凤听罢,便起身追打宝玉。此处的“黄子”,属于粗俗戏谑的口语。

《金瓶梅》中多次出现“行货子”一词,有研究者认为,“黄子”是“行货子”的讹变读音。“行货”本义指代物件、东西,用于指代人时,暗含“不堪之人、不是好人”的贬义。

笔者认为,“黄黄”一词的本源,可追溯至古人对蛋类食物的认知。蛋类久置变质,蛋黄极易腐坏发臭,黄色的蛋黄最为醒目。古人以此作喻,将品行败坏、声名不堪、令人反感的人比作腐坏的蛋黄,久而久之,“黄黄”“黄子”便成为指代此类人的方言词汇。

所有方言土语的流传,背后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渊源。“黄黄”一词,留存着鲁西南人数百年的语言记忆,是串联古今市井文化的细微纽带。一个简单的方言叠词,跨越数百年岁月依旧鲜活流传,既是方言文化代代赓续的生动见证,也是鲁西南地域文化质朴动人的独特底色。

张长国